

陶行知论 创造教育



王文岭 徐志辉 〇 编

陶行知教育文丛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陶行知教育文丛

陶行知论创造教育

王文岭 徐志辉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行知论创造教育/王文岭, 徐志辉编.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0.4

(陶行知教育文丛/徐志辉主编)

ISBN 978-7-5408-5316-7

I. ①陶… II. ①王… ②徐… III. ①陶行知 (1891~1946) —创造教育—教育思想—文集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1091 号

责任编辑 杨 键

封面设计 毕 业

版式设计 顾求实

责任校对 伍登富 余 蓉

责任印制 黄 萍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规格 170mm×240mm

印 张 14 插页 1

字 数 206 千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前言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教育家，然而若论影响，很少有人可以超过陶行知——在全国，有着数量众多的研究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组织和机构，有着人数众多的研究者和崇拜者。这也许不是因为他创造了多少高深的教育理论，甚至也不只是由于他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而是在于他本身就是一座丰碑——用他的信仰、他的人格、他的事业、他的作为所树立起来的道德丰碑。他的伟大蕴含在他的平凡生活之中，而他的平凡生活造就了他的伟大。

陶行知的信条是自立立人、自化化人、自觉觉人；他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自勉勉人；他将事业与信仰融为一体，从而使他具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种圣徒般的献身精神；他用辛勤的劳作、坚韧不拔的毅力担负着一个公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体现着他生命的永恒价值……正是这一切造就了陶行知，造就了行知精神。为了专心致力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以推进平民教育运动，他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之职，放弃月薪 400 大洋的教授职位；他拒绝北洋政府任命他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谢绝母

校金陵大学校长之职。为了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将全家从北京迁到南京乡下，甘心与农人为友，与“牛大哥”同眠，并婉拒挚友冯玉祥要他做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邀请，表示“晓庄事业，我要用整个的身子干下去”。为了使战时的难童能够读书，他在办学经费极端困难、靠四处募捐艰难维持的情况下，免去许多孩子的学费、书费、膳食费……面对着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大哉陶子”来表达我们对陶行知先生人格的无比敬仰。

陶行知怀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在他的教育事业中，他不仅提出了生活教育思想，而且使这一思想贯穿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他始终坚信“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始终坚持“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正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他才坚决反对将学校与生活、与社会相隔离，坚决主张教育必须与生活、与社会融为一体，并提出了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生活教育理论。

所谓“生活即教育”，即教育原本就是为了生活，教育原本就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意义。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所谓“社会即学校”，即生活是离不开社会的，生活原本就是社会生活；离开了社会就无所谓生活。生活具有教育的意义也就是社会具有教育的意义。社会作为一所大的学校，虽然可以将所有的社会资源当做教育的资源，但“社会即学校”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教育资源的扩大。社会是个人的集合所形成的，有什么样的个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反过来，个人又是受社会影响的，因此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个人。但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个人开始，也就是通过教育的力量来造就合格的共和国公民，为好的社会打下牢固的根基。既然教育的真义乃是实际生活的参与和改造而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那么顺理成章的就是如何生活就该如何开展教育，也即在生活中教育，用生活来教育——“教学做合一”。在他看来，教育法就是生活法，因为教育就是为了生活，放弃了教育也便放弃了生活，脱离了生活的教育就是无用的教育。他的晓庄、他的工学团、他的育才、他的社会大学，还有他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创造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等等，都始终贯穿着“教

学做合一”这一原则。于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便凝结在“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之中。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核心。这一理论萌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平民教育推广时期。此后，它就在长期的试验和不同的教育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生活教育理论统摄了陶行知的全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作为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它吸取、借鉴并改造了西方尤其是杜威的教育理论，但更重要的是它立足于中国社会实情和中国教育实情，为中国教育改造开出了一剂良方，对中国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大众教育、民主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众多耀眼的教育家中，陶行知就是以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持续不断的艰苦实践，成为最为卓著的教育家之一，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谈到对陶行知的评价时，唐文权先生曾写道：“我们相信，在卷帙浩繁的20世纪教育史稿中，生活教育作为中国教育章中卓然独立的一节，深刻地映现着当代的世情和国情，足可永垂久远，引人注目流连。总有一天，当地球村的居民共建文化纪念馆时，中国这一文化大户的推选名单中，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将因其对来者的悠长启示而膺登榜上，进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①1991年，陶行知最终因为他对中国和世界教育的卓越贡献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20世纪世界四大名人之一。

在世界各国都对教育的发展给予异乎寻常的关注的今天，在我们正为制定中国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而苦思冥想的当下，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固然十分必要，挖掘与利用中国传统的教育资源以振兴民族教育则更为重要。陶行知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土壤，以开放的胸襟兼收并蓄中西方教育理论，形成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教育思想。虽然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陶行知的精神却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它仍然对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学校定位上讲，学校必须改变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与学生生活相脱离的现状，使学校教育真正切入社会的实际生活，发挥学校服务

① 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页。

社会、引领社会、改造社会的作用，使学校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心；从人才培养目标上讲，学校教育要改变重成绩、轻能力等状况，把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合社会需要的、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共和国公民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教学方法上讲，必须改变普遍存在的重书本知识、轻实践经验，重灌输死知识、轻创新意识和能力培养，重教不重做，教学做相脱节的传统教育教学方法，重视和加强实践环节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使教与学能够在实践的环节上统一起来；从课程评价体系来讲，必须尽快改变不仅在基础教育中广泛存在，而且在高等教育中也依然存在的应试教育现状，使考试考查真正能够在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成为师生共同的“增压器”、民族创新力的“消融器”；从教育的整体协调发展来讲，要改变严重存在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重点与非重点差别、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差别，改变教育各方面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使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都能够协调发展，使我们的所有公民都能够尽可能享有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伟人已经远逝，但他留给我们的几百万言的著作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给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着能源；又似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给我们的教育实践提供着理论支持。这并不是说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就是完全正确、无懈可击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给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探讨空间，才使他的理论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才使他成为“受研究最多的近代教育家之一”^①。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受研究最多的教育家，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行动理论家”（胡晓风先生语），他的理论本身就是针对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创立的，是行动的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坐而论道的说教。尽管我们的时代离陶行知生活的时代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间隔，但我们仍可从他的理论和实践中受到启迪。这说明无论在什么时代，教育总有共通的问题，而能够解决共通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无论产生于什么时代，它的生命力都是永恒的。而要让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我们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学习和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

① 何荣汉：《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2004年版。

想就是必不可少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大量包括陶行知本人著作和与其教育思想有关的书籍和文献。如川版 12 卷本的《陶行知全集》，湘版 8 卷本的《陶行知全集》，还有《陶行知文集》（江苏省陶研会、晓庄师范陶研会）、《陶行知教育文集》（胡晓风、金成林等）、《陶行知教育名篇》（方明）、《陶行知教育名著教师读本》（金林祥等）、《陶行知教育名著大学生读本》（陆建非）、《行知教育论著百篇》（姚文蔚）……这些书籍和文献对研究、宣传普及陶行知教育思想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对不同领域的基层教育工作者而言，要么卷帙浩繁，缺乏专题性、针对性、系统性，不可能在一般教师中普及；要么虽然是专门论及教育的，但它涉及教育的诸多领域，未必能够使人们通过阅读这些言论而真正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未必能够使人们看出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认为，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就必须阅读他的原著，并将他的思想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去阅读、去了解，才有可能理出一个思想形成的大致脉络，否则就会误解甚至曲解一个人的思想，或者不看时间的变化而随意照搬某种思想。为了推动全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为了促进全国范围内学陶师陶的普遍开展，为了对陶行知的思想进行普及性的宣传，也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所整理、汇编了这套《陶行知教育文丛》。该文丛根据专题分类，尽量按照发表的年代顺序来编排，同时也对其中的重要篇目作了“导读”，以求对读者阅读原著和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有所帮助。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编印能够在促进广大师生学陶师陶、弘扬行知精神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衷感谢四川教育出版社为这套《陶行知教育文丛》的出版提供的无私帮助。

真心地希望读者对这套《陶行知教育文丛》中的错误批评指正。

徐志辉

2010 年春于南京晓庄

目 录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及其发展轨迹——本册导读	(001)
创造宣言	(011)
《金陵光》出版之宣言	(016)
因循篇	(020)
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	(025)
教育研究法	(030)
以科学之方 新教育之事	(034)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	(038)
试验教育的实施	(043)
第一流的教育家	(046)
中学教育实验之必要	(049)
大学教育的二大要素	(054)
教育与科学方法	(058)
行是知之始	(063)
教学做合一	(066)

在劳力上劳心	(069)
“做学教合一”的总解释	(072)
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	(084)
我国教育之出路	(097)
创造的教育	(100)
改革高等教育之管见	(109)
过去与未来的中学生	(112)
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	(118)
敲碎儿童的地狱 创造儿童的乐园	(121)
创造的儿童教育	(126)
创造的社会教育	(133)
创造的大学里最重要的是学术自由	(136)
民主教育	(139)
争取“六大解放”	(142)
仿我者死 创我者生	(144)
小学理科——给吕镜楼先生的信	(147)
重视生物学——致中国科学社	(149)
生物学或死物学——致郑先文	(151)
佛罗棱萨的教授	(152)
怎样学爱迪生	(154)
科学的孩子	(156)
思想的母亲	(158)
关于科学教育——致庄泽宣	(159)
怎样做一个科学的孩子	(164)
注重养生而不杀生——致郑先文	(168)
培养科学儿童以利创造科学中国之始基——致伍朝枢	(170)
儿童科学教育	(172)
以大自然为生物园——致台和中	(180)
全民族五大训练——致徐笃仁	(182)

科学训练要从幼稚园开始	(184)
火的故事	(185)
戏剧与教育	(187)
谈 诗——答吴立邦小朋友的信	(190)
国画也要提倡了	(192)
革命的教育和革命的艺术携手	(194)
为真理而歌 为老百姓而歌	(196)
科学 音乐二者相成——致郭咸中	(197)
创造年献诗	(198)
音乐的感受力和发展舞蹈	(200)
艺术是老百姓最需要最爱好的东西	(202)
真正的艺术是长青的	(204)
大众的艺术	(206)
关于诗的谈话	(208)

王文岭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 及其发展轨迹

——本册导读

创造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柱石，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创造的基石创造教育已为全世界所关注，在中国，借镜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研究时有成果问世。然就笔者看来，研究的重点仍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和局部的借鉴，忽视了动态的探究和未来的走向。陶行知生前就已经告诫后来者：“仿我者死，创我者生。”因此梳理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适时地把握他在不同时期对创造教育理论的贡献与实践所得，进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借鉴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开创性地指导当下的教育教学改革，不致生搬思想，死背原理。

—

两千余年封建专制政治下，九州喑哑，生气不存。因循先生陈法，固守儒学道统，亘古不变。晚清龚自珍用诗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呐喊：“我劝天公重抖

撒，不拘一格降人才。”1840年英人舰艇轰开了大清王朝的大门，天国从此崩塌了。在西洋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民族如一艘破烂的巨轮，飘摇于狂风巨涛之中。拯救这个古老的民族，不冲破传统束缚，开辟出一条新路，断然没有生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回应着时代的诉求，高擎着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急风暴雨般气势扫荡沉闷的阴霾，掀起再造民族文化精神的狂潮。然而，先王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根深蒂固，为此殉道者依然不绝于道。袁世凯复辟帝制，让世人看到革旧布新的维艰。只有在思想文化上打破“三寸金头”，彻底打碎精神的枷锁，才有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再造之可能。

是时陶行知正求学于金陵大学。金大是一所有别于中国传统学校的教会学校，这里洋溢着民主的气息，自由的思想，正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相呼应。陶行知适逢时代的际会，伫立于两者的交汇点上。1913年友好人士艾迪到校演讲《中华民国之将来》，陶行知担任翻译，演讲者历论中国面临的问题及青年应担之责任，抨击袁政府腐败，颂祷中华振兴，雄辩滔滔，受到金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同年金大学生举行《中国能否建立民国》的演说辩论，陶行知参加并获得胜利。^①显然，陶行知对再造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寄予莫大的热情与希望，同时怀揣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因循传统、固守陈法的顽固思想进行深入的剖析：

披阅英儒培根所著之《因循论》(Essay on Deceals)，兴起无穷感触。盖以生乎今之世，列强既具有进取之特性，其学术工商复高出吾人之上，以强佐强，进步一日千里。吾人欲与并驾齐驱，其进取当有列强十百倍之猛勇。即欲在世界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事蹉跎。苟仍萎靡不振，习于因循，则保守已无余地，大局何堪设想？爰引申培氏之说，撰著因循之篇，究因循之原因，揭因循之结果，俾国人晓然于因循之害，不独妨一己之发展，实足以障人群之进化焉。

这是他在金大因阅读英人培根的《因循论》激发起对于国势凌弱的思考，并将思考所得著成《因循篇》。他指出继续因循、保守，中华民族再

① 转引自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71页。

无立足余地，必须十百倍猛勇于列强，方能在世界上求得生存。他在是文中探寻民族因循性格之五大原因，即畏怯、懒惰、自满、自私和耽于宴乐；揭示因循文化之五大后果，即机会丧失、助长懒惰、自毁名誉，妨碍他人进步和效法他人因循而不思进取；知晓国人因循守旧之祸：“既足以自误，复足以误人，更足以误国。”他说：“吾人果自爱，则不当因循；吾人果爱人爱国，尤不当因循。”只要放弃因循，“则我国虽弱且贫，其前途必有光荣之希望”。

这一时期，他还著有《一夫多妻之恶果》，对因循至今的封建婚姻劣性传统进行尖锐的抨击：“风俗因之颓敝，道德因之衰微。贫弱之大原，富强之劲敌。”末则指陈：“数千年来，多婚之积弊太深，虽英雄豪杰，犹不能去此嗜好。”他疾呼：“今之当局诸公，海内志士，虽欲亟起挽救，犹非数十年之功，可以绝其根株；而况失此时机，任其滋蔓，则中国前途尚堪问耶！”他从民族出路的角度分析社会现象，强调国运如此，不可一日因循。

显然，陶行知在金大革旧布新的思想，已然包含有创造思想的萌芽，并且这个萌芽还在不断地生长。因为他在抨击因循守旧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主张效慕西方竟进发达的现代文明。他在《创刊中文报之缘起》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泰西学术，实高于吾人之上。何妨借人之长，以济己之短。”然而，他又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接纳西洋文明。譬如，金陵大学刊物原是英文版，在他的倡议下，创刊中文版。他说：“徒有英文学报，不过将我之所长彰之外人，而对于国内学子反不能尽其介绍之职，殊为憾事，故加入中文以承其乏。”显然，他是既要彰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于外人，又要介绍西洋文明于国民，融通中西，不因循、不排拒。中文版取名“金陵光”，他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说：“吾《金陵光》则作船工之灯塔，明其径途，所以佐迷津者之造业焉！”因此可以这样说，《金陵光》就是要作船工之灯塔，引导在中西文化碰撞融通中迷途的青年学子认清方向，以“造业”为己任，再造一个全新的民族。

笔者之所以在此详细介绍陶行知在金大读书时期的文章，因为这是青

年陶行知思考社会问题、阐述自己思想见解最重要的时期，或者说是他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直接影响或左右着陶行知今后的思想走向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陶行知从重塑民族国家的角度，强调必须改造旧有文化传统，引用西学之长，辟除因循守旧，张扬开创新风，其创造思想的火花异常闪亮。这也是他许身教育之后创造教育思想的文化基因所在。

二

陶行知将其朴素的创造思想引申到教育领域，是在1915年夏许身教育，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后，特别表现在1917年学成回国，执教南京高等师范和任职中华教育改进社期间。他一方面接受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呼吸着“五四”前后民主与科学的新风，在教育领域大倡科学方法与试验主义。譬如，1917年回国之初即著有《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1918年在南高师教育研究会上分次演讲《教育研究法》和《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1919年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和《试验教育的实施》，1921年底在南高师和东南大学附中四周年成立大会上演讲《中学教育实验之必要》，1922年应北京大学教育研究会邀请演讲《教育与科学方法》，在这一系列的论文和演讲中，中心论题就是科学方法，即试验主义。

陶行知首先着力剖析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格物致知”之弊。他说：“吾国数千年来相传不绝之方法，唯有‘致知在格物’一语。然格物之法何在？晦翁与阳明各持一说。晦翁以即物穷理释之，近矣。然而即物穷理，又当用何法乎？无法以即物穷理，则物仍不可格，知仍不可致。阳明固尝即物而穷理者也，然未得其法，格物不成，归而格心。”朱熹没有找到格物之法，王阳明最终陷入唯心主义泥淖，中华民族的科学萌芽因此枯萎了，创造精神因此湮灭了。陶行知深有感喟地说：“使阳明更进一步，不责物之无可格，只责格之不得法，兢兢然以改良方法自任，则近世发明史中，吾国人何至迄今无所贡献？”（《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

因为不得格物之法，我国数千年教育，固守传统，世代相袭，固守

“前人之说以遵循之”，无所创新；近代教育则又仪型他国，专事仿效，“徒袭外人之余绪，而不思自己有以考察之”。此二种皆不可能创新说，辟教育之新天地。（《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

正确的格物之法是试验，只有试验才能探得事物之真理。陶行知说：“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试验虽不必皆有发明，然发明必资乎试验。”他还列举欧美诸国大行试验主义教育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盖能试验，则能自树立；能自树立，则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换言之，唯有不断试验，才能有教育之革新，从教育救国论的立场上说，才能救中国，才能造一全新之国家。

在强调整验之于发明的重要之时，他进一步阐述如何建设试验的教育。他提出四种具体的方法，即注意试验的心理学，设立试验学校，注重应用统计法，注重试验的教学法。他认为前三种为改造教育家所应有的手续，可使他们得了一种精神方法，能够发明教育的原理。第四种为改造国民应有的手续，可使普通国民得了一种精神方法，能够随时、随地、随事去做发明的工夫。总之，“会试验的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都是试验教育所要养成的”。（《试验教育的实施》）

他把试验与发明、试验主义与教育革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把两者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1919年4月21日他在《时报·教育新思潮》专栏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寄托了他对一种新型的教育家的期盼。在他的理想中，第一流的教育家应该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前者不拘陈法，敢于试验，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最具创造精神；后者不惧苦、难、孤、死，把“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视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勇于担责，最具开辟精神。有了开辟精神的教育家，全体国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有了创造精神的教育家，我们才能摆脱旧教育的藩篱，中华民族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用教育的力量抗御外侮，拯救国家方能真正得以实现。该专栏的主笔蒋梦麟撰写按语说：“陶先生，你讲的一席话，我读了便觉精神起来。这种话我久不听见了，可算是教育界福音。”

“五四”时期陶行知猛烈抨击因袭陈法的传统教育和仪型他国的洋化教育，主张以试验主义取而代之，以科学方法革新教育，不仅明确提出“去旧之方”，而且还提出了“创造精神”、“创造的教育家”。胡晓风先生指出：“在五四运动中，他在自动主义（Automatism）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的基础上提出‘创造’作为‘科学’与‘民主’最为重要的补充。”^①虽然他更多地着力于在理论上阐述其创造教育的理想目的，但其中已经思考具体的实施步骤，可以说，这是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由理论建构走向具体实践的过渡转折时期。

三

陶行知将其带有试验主义色彩的创造教育思想践行于教育实践，集中体现在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和上海山海工学团时期。1927年他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寅会上先后演讲《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1929年著述《做学教合一之总解释》，1931年著《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1932年著《我国教育出路》、《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从教育上谋国难的出路》等，系统地阐述“先行后知”和“教学做合一”理论，反复强调“做”和“行”的重要性，倡导手脑并用。这是其创造教育思想形成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首先，关于知行关系的重新认识。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尚书》云：“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孟子、荀子以降，宋人程颐、朱熹，明人王阳明，清初王夫之，清末魏源、谭嗣同，延及近代孙中山等，都对知行之先后、轻重、难易、合一或分离等，作过相当精辟的阐述。陶行知早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即研究王阳明先知后行的学说，并易名为陶知行。十余年来，他深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回国后又在平民教育运动的时代大潮中亲身试验，认识到王学的谬误，并开始对王学进行彻底清算。他说：“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是知之

^① 胡晓风：《关于陶行知影视专题片的通信》，《生活教育》2010年第1期。